

第 一 章

◎绪论：缩短历史和现实的距离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过去，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希望来掌握未来。

*

*

*

因而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我们骄傲和自卑的理由。我们不必为过去而过多地烦恼。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并揭示其与未来的关系。

——引自李约瑟著《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

历史是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它的进程无疑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逻辑。但是，认识这些规律和逻辑真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唯其如此，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前，现代科学对小至细胞的基因，大至银河宇宙都能揭示其奥秘，生物工程、宇宙飞船、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日新月异，不一而足。反观人类社会，我们对自己每日每时都在参与创造的历史，研究情况究竟如何呢？认识水平究竟如何呢？说一句不客气的老实话，两者之别，不啻天壤。其丰富和贫乏、深刻和浅薄的反差之大是谁都掩盖不住的。试问原因到底何在呢？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自然现象不仅是人类可以通过复制而直接被感知的事物和过程，而且，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每一重要的认识飞跃还能给自己直接带来越来越大的福祉。但是，历史研究则不同，由于它具有不可逆性，就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试验以观真伪，其成果也难以弥合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还比较缓慢，这种距离因此而较短，历史和现实的差距还易于被发觉和总结，因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般都比较重视历史和史学。中国史学也曾取得了与时代相称的成就。最著名的例证是伟大的司马迁。他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的崇高追求，他那深刻的识见，他那敢于批评时政、特别是当朝皇帝的无畏勇气，他那不朽巨著《史记》的风采——“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令人神往。但是，勿庸讳言，我们的史学现在出现了危机。它越来越故步自封，它老化了。史学的空前冷落是这种危机的直接表现，而真正的根源却在于它脱离了与广大群众和现实之间的血肉联系。如果史学再不更弦易张，依然固我，那就势必由于生活的快速嬗变而造成与现实更大的脱节。本来，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没有比未来更为重要的了，而认识未来，除了通过研究历史之外就别无他途。无论是一个集团、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整个世界，

“往者已已矣，来者犹可追”。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生气，是否有活力，看一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历史持什么态度，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重视历史正表现出它对未来的关心和信心；深刻的认识则表现出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觉醒。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固然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试图找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也更加困难了，唯其如此，史学不是无用了，或者可有可无了，现代社会对史学的需求反而更高也更加迫切了。如其不然，我们的先辈、我们的父兄用血汗所换来的这唯一的经验（包括惨痛的教训），岂非统统要付诸东流？如其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岂非等于又回复到了原始蒙昧时代，还是“盲人驾瞎马，夜半临深池”？是不是应当这样说，当前的史学危机证明：现时代的快速嬗变已在呼喊着新史学，而史学也只有在变革中才能找到自己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生命。

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农民国家，迄今为止，它还是世界上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研究中国历史虽然应该涉及各色人等和一切方面，不过，无论如何，农民始终应是我国史学主要的研究目标。否则，我们写出来的历史最多也只能是与我国历史主体间接有关的枝节。本书就是以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为对象，用鸟瞰的考察方式所作的一次大胆尝试，试图从总体上评估其发展轨迹和历史价值，从而为缩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提供一种新视角。

第一节 史学的反省和农民的觉醒

自人类出现以来，农业的发明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革命。它使我们从此摆脱了采集渔猎经济中完全依赖自然条件的限制，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包括动植物）和衣料。没有农业的发明和发展，就不可能有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

会分工的发生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定居、村落和城镇，就不可能有以文字为代表的文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业发明的历史意义决不亚于近代的工业革命和当前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

根据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和西亚是世界上同样重要的农业策源地，迄今至少已有 8000 年以上的时间。在我国，起初是一种以粟为主要作物的原始旱作农业，它与发源于西亚以灌溉为主的小麦农业大异其趣；随后在这种原始旱作农业的基础上又生发出一种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个体农业，它创造出了传统农业中罕见的高生产率。我国的历史所以造成了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过程，我们的民族所以孕育了独特的中华文明，我们的社会所以在将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型实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由农民大众的劳动奠定的。他们无疑是中国历史的真正主人；时至今日，他们仍占我国人口的大约 80%。至于其余 20% 左右城市居民，只要上溯二三代，他们中的多数仍可以发现自己的祖先原来也是农民；即便上溯几代后没有找到农民祖先，由于持久的传统和强大的农村氛围的双重影响，从他们身上也都不难发现农民习俗和思维的胎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在传统的精耕细作农业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而中华民族的 8000 年历史可以说始终就是一部农民史。过去，是亿万农民创造辉煌的农业文明历史，到现代则是他们极为艰难曲折地力图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因此，在中国，假如离开了农民的历史，既无法了解中华的过去，也谈不上认识民族的未来。然而，在我们这个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是农民的民族、农民的国家，即使不能说从来没有、也应该说是恰恰始终最缺乏农民史的研究，因而也就最缺乏对农民的了解。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史学家早就欠着的一笔应该偿还的史学债，而且，我相信越是推迟偿还就要付出越加沉重的代价。

中华文明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具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它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系统地记录了几千年中华发展的历程，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过，传统史学，除了司马迁等少数几位天才史学家之外，它的根本弱点在于轻视农民。农民长期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没有任何地位可言。这是传统史学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农民群众才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人被载入史册。历史将证明，这是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的重要一步，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现代史学远远没有真正完成这个历史赋予的使命，或者也可以说，我们非常可惜地丧失了一次偿还债务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新式农民战争创建的。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来被摈斥在史学大门之外的农民，一夜之间就被奉为我国历史的主人而载入史册。其实这一史学上的巨变只是政治变动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农民史在我国的出现，不仅直接以中国农民战争史命名，而且，研究的旨趣全在发现和颂扬农民的反抗斗争及其革命性。这样，伴随新中国而诞生的中国农战史就势必要同新中国的前途一样，经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其中最根本的教训之一，恐怕要算出现了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偏狭的排他性。农民战争最初被誉为“五朵金花”之一，接着被日益拔高其地位，扩大其作用，到最后几乎独占了整个史学园地，并变成判别一切历史事件和史学家的价值标准。曾几何时，这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新生学科就在“显学”化的过程中排斥了其它学科分支和不同观点，同时也就窒息了自己的生机。此外农战史的研究工作起初还多少有原苏联同行的一些学术成果以资借鉴，不久，连这唯一的吸收外部空气的小通道也关闭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出现本是打破传统史学排他性的产物，结果竟发生了比传统史学还要严重的排他性。这真是具有悲剧意义的讽刺，很值得记取和深

思。从传统史学的摈弃和鄙薄农民到一味拔高农民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一味颂扬农民战争，事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两个 180 度的大转弯合起来无非是作了一个 360 度的旋转。巨大的反差难以掩盖骨子里两者的共同性。此之谓殊途同归。当然，历史决不简单地重演。但我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教训难道还少吗？难道还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吗？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农民为中国历史主体或主角，还仅仅只是从历史的客体，即历史的客观进程意义上而言的，至于在中国历史漫长的进程中农民实际所占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究竟如何，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在法律上就被明确规定是“贱民”，乃至是奴隶；另一种是自由民其名，“贱民”其实，这就是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②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宪法明文规定了农民在国家中的主人地位，农民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以及这一点是否真正在实际中兑现了，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简而言之，中国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在历史和现实中始终受到社会、受到他们自己的认识两个方面的扭曲。当广大农民还处于事实上的奴隶地位而自己对此还不觉悟之际，或者如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作为历史主体的农民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不仅为传统史学看作天经地义，而且在农民那里也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或者如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即使新史学曾经给予农民这种史学上的主体地位，但随后不过一股思潮颠簸，这种地位顷刻之间就动摇了。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到近年会冷落到门可罗雀地步的根本原因。歪用一句唐诗，真可谓“来是空言去绝踪”。相反，如果一旦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自己也开始觉悟了，主体地位并不是从外给予，而是出于经济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自己强烈的需要，问题就会根本不同。

只有到这个时候，历史的主客体地位才能出现合一，从而为农民史建立巩固的基础。这也就是说，农民历史地位忽高忽低这种现象的发生，正是中国历史的主体尚未摆脱经济和文化上的贫穷状态，广大农民既缺乏史学上的需要，也缺乏条件实现这种需要的反映。没有历史主体农民的觉醒，真正的中国农民史是不可能产生的。

自 80 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个修纂地方志的高潮。据《中国新方志目录》的统计，截止 1992 年，已出版各类地方志 9000 多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志（包括区志）共计 1234 种。此外，更值得特别引起重视的还有 9 种村志。由于乡镇志的编写并非出自上级的布置，而村志更是民间自发的活动，上述统计，尤其是村志的统计可能大大小于已经和正在编写的实际数。这是发生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可惜，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说到农民觉醒，政治上的解放自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的基础却只能是两个积累：通过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使广大农民摆脱经济上的贫穷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如果说政治上的解放可以通过一场运动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摆脱贫穷落后则唯有依靠亿万农民自己长年累月的积累，就是说，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渐进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1978 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迄今主要还在沿海地区）开始脱贫致富是建国初土地改革的继续，而那些富裕起来的乡镇和村主动要求编写自己的历史正是农民觉醒的一个集中表现。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乡镇志的事实表明，实际已经使这些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他们既需要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不错，相对于广袤无比的农村和农民来说，现在已经富裕起来的村乡镇只占少数。唯其如此，中国农民中出现的这种觉醒现象也就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预示着 10 亿人口的未 来 ,更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把它视为民族的觉醒。

中国农民在客观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它在史学上的地位之间的悖离,并不是由任何人的过错造成的。在这里不必作任何指责,也不必怨天尤人。至于中国是否能够在今后的几个世代里消除这种悖离,弥合历史造成的错位,也将取决于亿万农民自己的实践,决非任何外力所能赐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走上这条伟大的道路之时,前程充满着困难和风险。作为中国的史学家是不是应该从中看到,在这事关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实践中一个史学家应尽的职责呢?

中华文明所以生于东亚大陆,长在这块大陆,发育了独特的农业,形成为一个农民民族,这大概是我们的先辈明智的选择。但对于我们后代来说,这早已是历史,是一种先于我们存在的传统,是一系列我们自己不能选择的客观条件。当前,中国正在创造现代文明,然而,十分明显,这种创造必须在以往既定的传统和条件下进行,必须符合我们这个农民国家的历史特点和逻辑。

第二节 跳跃性的发展和长期性的停滞 ——探索历史发展的奥秘

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独特的发 展逻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历史的范围极为广阔,史学家怎样才能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发现并把握这种传统和逻辑呢?我以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破除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

前面已经指出,8000 年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和文明始终是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着农民的民族和文明。我们有高度发展

的新石器文化，表明我国经历过原始社会，但我国并没有经历过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社会。我国的封建文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从客观条件上看，应当比社会文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我们的西欧国家更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我国却长期滞留在传统农业的阶段上，没有出现这样的飞跃。到现代，继西欧、北美之后，北欧、日本、澳洲等都起飞了，而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却一次又一次地化为泡影，以致迄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家。总之，中国的全部历史可以凝结成这样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和农业的文明？既然我们这个农民的国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我们的希望何在？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不能发生资本主义却能够跨越这个发展阶段，并创造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横亘在当代中国的面前，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回避不了的，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农民史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根据现在掌握的发掘成果，自人类从东非产生以来，迄今已有 300 万年左右漫长的历史，有无比丰富、多变、复杂的经历。对此，历史学家们由于方法各异，史观不同，自然也各有五花八门的看法、描述和分期。为了免去不同观点的干扰，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些，先客观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一番宏观的扫描。

从宏观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有一个事实应该可以肯定：文明中心始终在不断转移，并且清楚地呈现出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假如我们把这 300 多万年划分为原始、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四个段落，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创造文明的主要足迹：东非是我们的摇篮，环地中海东部跨非亚欧地区是古代文明的中心，亚洲创造了中世纪最灿烂的文明，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到今天为止，西欧、北美无疑是现代文明最发达的地方。简言之这是一条人类从东非猿人发展为现代人的连绵不断的上升曲线，而这条上升曲线则是以人类的每一重大的文明进步为坐标的。

我们试转换一下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观察非洲、欧洲、亚洲、美洲中的任何一洲，或者是东亚的中国，甚至更小一点地区，历史的轨迹仍然是该洲或该地区的文明中心不断地转移的曲线。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历史进程就不是一条始终向上，而是一条不免令人吃惊的升降起伏的曲线。当欧洲、美洲、亚洲，总之是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一片洪荒之际，非洲率先脱离了自然状态，并且曾经在历史进程中长期独占鳌头，但后来严重地衰落了。这个大陆是现今世界最落后的地方。中世纪以前中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化的发展高度和随后的突然衰亡，曾令历史学家目瞪口呆。然而，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美洲北部迅速崛起，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对于历史来说，这真不过是一瞬之间——这块先前一直是苍茫荒原的大陆，已经变成为当今世界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再看东亚的中国，自元谋猿人以后的 180 万年间，也真是沧海桑田，难以一一细说。即以近几千年而论，先前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几个著名平原，唐宋以后就让位于南方几个大湖盆地和江河谷地。当战国秦汉至唐宋之际，中华文明，无论就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度，还是就其博大的范围而言，确实居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然而，自明清以来，同样确凿的事实是，老大的中国是如此长时期地陷于停滞的深渊，以致令国人困惑莫解和心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要之，微观历史，这是一条由历史发展速度和方向的不同而决定的演变曲线，这里不仅有变化的速度不同而产生的升降起伏，还有演变过程的异向而造成的许多曾经生气勃勃的文明衰灭。

经过宏观和微观考察，现在让我们将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叠合起来，比较全面地看一看历史进程的图象：人类的历史不管在任何时代，也不管在任何地域，由于接着每一种文明兴盛的没有一个不是衰败乃至毁灭，因此，历史发展总是由宏观上的不断上升和微观上的升降起伏这样二条不同的曲线交织在一起的画面。

十分明显，历史进程中的宏观与微观是不同构的。正因为这种不同构，历史全部进程中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一二个范围比较小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恰似片片绿洲，环绕在四周的是一大块经济文化上程度不等的落后地区。毫无疑问，总的来看，世界或地区的文明圈始终在逐渐扩大。这是最令人鼓舞的，因为，这标志着历史的真正进步。·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也就使历史学家可据以划分出时代或阶段。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忽略这不同构形成的另外一面：迄今为止，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仍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22% 左右，人口的 15% 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则占地球和人口的绝大部分。这也就是说，只需看一下现今世界，宏观与微观的不同构是如此清晰地突现在眼前，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并尽力找出衔接的桥梁，否则就难免陷入极其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而无法自拔。至于古代的历史，那时文明程度较低或很低，人类互相间的交流相当不易，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不同构自然会更严重，以致于出现好几个不同的文明中心以及多层次、多色调的文化圈，往往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分辨。最常见也是最糟糕的情况是，人们往往因此而易于把现状凝固化起来，既用以解释历史，又用以预测未来，陷入最短见的盲目性。即以现代而论，欧洲中心论或全盘西化论等等就是由此而误入歧途的。

宏观与微观的不一致始终严重地困扰着历史学家，因为，他们除了如同常人要面对纷繁的现实世界产生直观的困惑之外，在专业上还要面对无穷复杂多变的历史运动过程困惑于文明的变异，即一系列像谜一样的升降起伏兴衰荣辱的历史演变。每一个历史学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寻找着它们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史学的引进使我看到许多国外、尤其是西方同行早已在认真地探索和解释它背后深层的奥秘，并获得了可观的成绩。他们的史观迥然而异，不过，力图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则是较为一致

的。年鉴学派由强调全面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到进一步强调长时段，施坚雅的宏观区域学说及其在研究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等等，都是很值得称道的例子。然而，如实地说，就我所见，尽管西方史学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他们至今并未真正找到衔接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

我是以研究中国农民史作为自己的职志的。作为史学队伍中的一员，自然也一直关心着这个历史的奥秘。我以为，探索这个历史奥秘的关键在于，找到造成历史发展不同速度和方向，亦即本节标题所谓的跳跃性的发展和长期性的停滞交替现象的根源。借此机会我想扼要介绍一下十几年以前自己研究的初步结果。因为就在刚刚触及这个问题之后不久，工作的变动使我中断了研究工作将近 10 年。这样做一则便于衔接，再则便于大家批评。下面摘引的这个表述是由 10 年前对中国农民史研究引发而作的尝试：

“近年来，农民史的研究不是进一步被加强了，反而有被削弱的趋势。有个别史学工作者甚至还提出了一种鄙视农民，从而也鄙视我国历史的观点。尽管我国已经通过新式农民战争实现了比西欧资本主义各国更高的历史飞跃，建立了社会主义；然而，这些同志却视而不见，头脑里仍然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具有先进性这样一个孤立的模式。似乎我国既然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落后了，我们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也就会陷于六道轮回之中，找不到出路。其实，他们哪里知道，人类历史必然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形态在历史中的每一次更替的实现，无论在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和现代，从来都不是由那些在前一种生产方式发展中占有先进地位的国家、民族、地区按部就班地接着又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而总是由原先较为落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跳跃式的兴起，成为历史的新主角。试看全部历史，人类最早的发祥地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和东亚的中国，但最早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地方却在埃

及和两河流域；奴隶制在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罗马获得了最高的发展，但封建制却在奴隶制并不发达的东方首先发生；封建文明在中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摇篮却在封建主义发展中曾经落后的西欧；西欧北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顶峰，但社会主义却在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东方——苏联和中国等地首先实现。从形式上看，我们这样一个在向资本主义发展中落后的农民国家，竟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早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似乎是不正常的，不合逻辑的。实际上，从历史的辩证运动来看，它和先前在封建主义发展中落后的西欧诸国首先进入资本主义一样，是正常的，必然的。’^③

最近十几年世界的变化很大。从文字上看，与本文关系最大的一点是前苏联的瓦解；从文字上不能直接看到的，我认为主要是战后国外史学的迅速发展和最近十几年的大量引进，以及国内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入，这其实是更重要的变化。用这些来对照自己以往的观点，使我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肤浅，感到有必要修正自己的某些看法，同时又感到有可能进一步把我十几年前的初步探索再稍稍推进一些。

人类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类人猿。随着人口的繁衍，人们必须离群析居，于是有栖息环境的不同，相应地也就有不同的谋生方式，形成不同的体质，出现不同的追求、信仰和风俗习惯，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不同的种族、部落、民族，以致最后在互相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信念而发生的矛盾和斗争（有时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战争）中产生了各自的国家。所有这些形态上互异、利益抵牾的种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的发生正是人类逐渐进步的标志。试想，如果没有诸如此类的差别和不同，类人猿就始终还是类人猿，决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人。换言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形形色色的变异为前提的。但是，不管历史发展中人类发生了多大的变异，也无法改变他们出自共同的祖先和至今仍生活在

同一个星球的事实。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过去到未来还有共同的发展大方向。任何一个种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用了无数世代人之努力才获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别一个种族、部落、民族和国家来说，只要能够真正实现了交流，他们可以很快就加以掌握，而并不需要按部就班地再重复经历原来创造它的漫长过程。这也就是说，形式上各异的种族、民族、国家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和人类社会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为了揭示这种关系，很多学者做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能像马克思那样，创立出一个完整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找到历史发展奥秘，我们还不能离开它的帮助。

人们知道，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贡献是唯物史观。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迄今仍然可以这样说，还没有另一种历史理论在科学性方面能够取代它。关于这一点，现代西方史学家也有一些客观的评论。如美国著名的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导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对现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强调了社会作为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关系的整体而运动的思想以及力图找到历史现象在其中发生的结构要素，把这些同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联系起来，系统地阐述可以分析造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概念模式。”^④应该说格奥尔格·伊格尔斯针对西方史学而作的这种评价，今天对于中国史学同样具有启发性。

历史上大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现，往往易于被教条化，被凝固为僵死的公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⑤他们在许多篇章中对把唯

物史观教条化的抨击是如此严厉，以致马克思曾愤懑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然而，事实却是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严重地教条化了，特别是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社会形态学说。它所造成的误解在国内和国外都是这样的持久、普遍和深入人心，以致有必要请读者十分耐心地一同来回顾一下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间马克思就俄国历史发展前途两次谈到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我以为即使对那些多次读过这两封信的人来说也很值得。

第一次是 1877 年针对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而发的。学者们都知道，为了阐明西欧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特别写了《所谓原始积累》一章。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该年的“祖国纪事”杂志上写了“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把马克思在这一章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似乎“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即共产主义。马克思当即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断然驳斥这种“超历史的”滥用。他辛辣地把这称之为“万能钥匙”，并且说：“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侮辱。”^⑦

第二次是 1881 年为回答维·伊·查苏利奇——当时“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家——的提问。

维·伊·查苏利奇说：“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她接着说：“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

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马克思字斟句酌，四易信稿，对这个问题再次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在《资本论》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而在当时的西欧“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接着他又说：他是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的。“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⑧

认真地研读一下马克思的答复，人们一定会在许多方面引起思索，这里先谈两点：

第一，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他写《资本论》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而“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至于俄国，也从 1861 年改革开始向资本主义试步。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把这个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始终“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甚至把它称之为“西方的运动”；第二，马克思研究得最充分透彻的是当时的资本主义，谁都清楚，他认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归宿是共产主义。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严肃地拒绝了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以便最后都达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其实，何独俄国，只要翻开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著作——《共产党宣言》还可读到这样的话：“它（资本主义——著者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

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⑨这也就是说，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原来各落后国家、民族不是必经资本主义，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这就是说，早在马克思主义刚刚确立的时候，他们就已认为，与世界上部分地区资本主义并存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非资本主义。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将近 150 年了，今日的世界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形态之中。历史进程是这样有力地证明着：马克思之拒绝那种认为一切民族（无论是俄国还是其他国家和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具有何等深邃的识见和洞察力！以往曾出现过的各式各样的历史观中，最常见也最浅薄的就是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发达地区和周围不发达地区并存的现象凝固起来，视为这既是历史，也是未来。更荒谬的是由此划分出优秀民族和劣等民族。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此种愚昧之见是根本不同的。关于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希望能引起读者足够的注意。

读者或问：若如所论，试问应该如何解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呢？难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任意的、没有规律可循的吗？

当然不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所作的表述中的一个部分；唯物史观所回答的不是某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过程，而是从时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等诸方面都包含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和演进阶段。也就是前一节提出的宏观历史运动规律和演进阶段问题。至